



扫二维码 看大学视界

过分的竞争、简单的撤并有可能会破坏大学学科发展的生态。这种重点建设的思路亟待转型,高等学校的体系、学科发展的群落需要引起重视。

教育学科遭遇裁撤:功利 or 理性

■本报记者 韩琨

上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对于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们来说,应该是职业生涯中相对特殊的一天。毕竟,那是他们作为兰大教育学院教师身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7月15日,兰州大学校方正式发布文件,宣布撤销该校教育学院及内设机构。随着教育学院的撤销,校方作出了一系列专业及机构调整与人员安置。

记者注意到,这样的调整并非兰州大学一所学校孤立的行为。近两年来,多所高校的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教育相关的教学科研单位遭到不同程度的裁撤。

高校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背后是怎样的逻辑,又反映了我国高校发展中的什么问题呢?

密集的调整与裁撤

宣布撤销教育学院的同时,兰州大学宣布重新组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慕课发展中心以及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隶属于原教育学院的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和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入管理学院。

人员安置方面,从今年起,兰州大学将停招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而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则将继续。教师们原则上并入管理学院。

同样遭遇身份变化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老师们。今年5月前还属于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何雪莲,如今的身份变成了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研究员。

时间继续向前。今年上半年,2001年12月成立的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最近被校方撤销,调整到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并被更名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室。

去年11月20日,中山大学印发文件撤销教育学院。同年4月3日,南开大学第二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取消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独立处级建制,保留机构名称,调整为隶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非处级研究机构。

面对这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科研单位被校方裁减的变化,不仅教育学领域的学者们遭到了冲击,也有不少其他高教界人士对此产生疑问。

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教师胡乐乐表示,在这些已经发生的改变之外,还有一些著名大学正计划在接下来的学科和建制调整中将教育学科裁撤或者边缘化。但在他看来,多所高校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客观上是因为‘双一流’建设的压力”。压力之下,高校需要调整相对弱势的学科发展。

某重点高校原高教所所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已经被调整到其他学院工作,面对这样的调整他不便发表评价,但他强调,一所大学应当保有对高等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以供校方更好地咨询及规划大学未来的发展。

历史与现实交织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建立不是自生自发的行为,而是自上而下的推动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行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硬性要求在半个世纪之后,也应该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何雪莲提醒道。换言之,要解释教育学院、高教所目前遭遇的变化,先要理解这些机构产生的背景及发展历史。

也在此番裁撤机构中的某高校副研究员王志(化名)告诉记者,之所以一些高校对教育学院、高教所等进行裁撤,主要还是因为发展情况并不如人意。而这一切,也要放在历史之中理解。

与何雪莲提到的一样,王志告诉记者,高教所等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就是由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推动的。

就在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建设,使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更好地发挥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应有的作用。

在这样的要求下,教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出现了人才缺口,在就业方面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机会。但随着几十年的发展,相关岗位已经饱和。再加上教育学在考研方面的难度和门槛都比较低,也吸引了不少希望改善教育背景的学生报考。这也使得教育学科所培养的人才供过于求。

“如今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往往面临窘境,不好就业,生源不如以往。面对这样的情况,学校作出裁撤及调整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与‘双一流’建设的压力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王志说。

何雪莲则为多所大学教育学科最近发生的变化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她认为,这其中折射了我国高校存在的问题:人员缺乏真正的激励机制,只进不出,干好干坏都一样,滋生惰性,最终必须

通过机构的裁撤和调整行为来加以改变。

“根据我对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有限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此举是好事;有能力的人可以天高任鸟飞,无能力的人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对待。”她说。

对于教育学科看起来在高校改革中首当其冲的现象,何雪莲表示,她并不认为这是教育科学的特殊现象。

她说:“所有研究机构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研究机构自身无法高效地自组织起来,最后只有通过校方的强行行政指令推动,如果一个研究机构数十年一直惨淡经营,那根本没有保留的必要。如果无视具体情况,先人为主以迫害一被害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就无法明白学术自由可能被用来掩饰低效、裙带关系、论资排辈、寻租、谋求一己私利。”

何雪莲从另一个角度提醒道,行政指令未必像看起来那么令人反感,而学术自由这些“好词”实际上也未必像听起来那么美好。

那么,遭到裁撤的教育学科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呢?

扭转思路,理性变革

在冲击之下,业内人士的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调教育学科的重要性,认为大学至少需要保留研究教育的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变革可以把高教所的职能交给市场,那也没什么不好。

例如,胡乐乐就认为,对于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教育学科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教育学科的存在能够让师生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服务学校;另一方面,一所真正

的综合性大学需要文理兼有,而教育学是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雪莲则表示,要办好大学,自然需要对学校情况有所了解,但未必需要有教育学科建制。她举例道:“就像我想知道选举情况,只要请专门的公司进行民意调查与分析,而不必自己办一个调查公司一样。”

在她看来,高校内部的实体,从行政机构到实体学院,要想切实办好,并不需要教育学科,只要与办得好的兄弟院校相互沟通,或者直接在一流高校的网页了解讯息,再有的放矢地加以改进即可。

“这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现在世界一流高校都把自己的培养计划、愿景以及具体操作情况明明白白地写在网上,一个学院或机构真想办好,直接去查看人家怎么做就好了。如果一个学院和机构连这点工作都懒得做,也可采取外包行为,针对具体问题聘请公司,由专业咨询公司提供解决方案。”她说。

缩减规模,找准定位,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是几位受访专家为我国教育学科接下来的发展开出的“药方”。何雪莲认为,一所大学要办好,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随后应做好两点。

“首先,孵化和支持与自身定位直接相关的学科或工作。其二,对于与定位无关甚至相悖的学科让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如果你很强,我让你更强;你如果很弱,我还要从你这里拿走你已有的。”她说。

当然,教育学科看起来首当其冲可能只因为其更为高教专家们所关注,在重点工程建设尤其是强调“绩效”的指挥棒面前,恐怕有更多的高校陆续对发展不佳、评估不靠前的弱势学科加以裁撤。

“学科评估、排名、一流学科竞争。”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对于高校改革为什么要撤销教育学院这个问题的回答点出了这三个关键词。这几个关键词也会是解读接下来高校改革的一把钥匙。

但是在他看来,这里“也包含了部分国内一些所谓一流大学的功利性应对行为,过分的竞争、简单的撤并有可能会破坏大学学科发展的生态”。马陆亭强调,这种重点建设的思路亟待转型,高等学校的体系、学科发展的群落需要引起重视。

“过去几十年的重点建设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例如‘985工程’‘211工程’使得我国的重点大学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接纳,我国高校逐渐形成多元发展的局面,学校内部的高等教育基本元素得以壮大等。”马陆亭说,当然,这些重点建设工程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他强调道,“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经改革开放到如今,高校重点建设工作的前提和依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陆亭说,过去的重点建设方式适用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迅速调动社会资源,使高等教育按照政府计划和需求安排的情景,但现在,社会、经济、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重点建设的示范性已经不足。“因此,高校的重点建设工作应该要注意适应这种变化。”

现场

架科学之桥 觅传播之音

——首届两岸大学生科学传播能力提升训练营侧记

■本报记者 陈彬

当客车将要驶入浙江大学时,坐在车上的刘敏慈忽然发现,这座大陆著名的学府竟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校门”。

今年正在读大四的刘敏慈来自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她的学校是有一座很像样的大门的。因此,眼前这所“无门”的大学让她有些新奇。同行的学生则向她解释,浙大这样的设计象征的是一种容纳百川的精神。

两天后,在这座“无门”校园的一间会议厅里,当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刘敏慈讲起这段经历时,台下来自海峡两岸的年轻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善意的笑声,就是在这样的笑声中,一场属于他们的训练营开始了。

一群朋友

刘敏慈参加的这场训练营叫作“首届两岸大学生科学传播能力提升训练营”。这次活动由浙江大学主办,活动邀请了来自台湾5所高校的25名学生,以及大陆两所高校的18名学生参加。在训练营中,营员们除了要参加各种科学活动,领略苏杭地区独特的文化外,还要以小组为单位,为杭州当地的数十位小朋友设计一套有趣的科学装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向小朋友们讲明白装置背后的科学原理。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训练营的分组是很有讲究的——全部43名同学被分为8组,每组成员必须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不同高校。此举加强海峡两岸学生间交流的用意非常明显,但同时也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能够很快地与来自于海峡对岸的小伙伴熟悉起来呢?

裘道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专业的学生。他也是此次参加训练营的学生中,少有的几个非理工专业学生。作为一名“非理工男”,裘道的性格虽然要活泼一些,但他也会面临同

样的问题。好在裘道平时酷爱篮球,而恰好同组中一位叫作吕孟孟的台湾学生也是个球迷,于是两个人从NBA谈起,共同的话题很快使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球友”。

事实上,虽然这些年轻人彼此从未见过,但就像裘道与吕孟孟一样,共同的爱好与话题迅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而在另一方面,主办方也想到了营员们的沟通问题,因此在训练营正式启动前,他们组织营员远赴安吉,在那里进行了一次皮划艇集体水上活动。

来自浙江大学的营员单萍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活动的最后,指导老师要求所有的皮划艇围成一个圈,这个简单的要求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加之单萍的皮划艇相对较小,被夹在两条长艇之间的她很难触到身旁的队友,而此时,一位台湾学生主动将船桨伸了过来。

“在此之前,我还是感觉因为成长环境、思想方式的不同,我与台湾学生之间还是有些隔阂,但当那位台湾同学将船桨伸来的一刹那,我觉得我和他们终于成为了一个整体。”单萍说。

无论是共同话题下的迅速升温,还是一刹那的情感迸发。总之,经过简单接触,营员们迅速从陌生人变成了好朋友。下一步,他们将面临一场真正的“训练”。

一点对比

此次训练营,主办方将主题定位为“桥”。这一主题既契合苏杭当地文化,同时又寓意架通两岸大学生沟通之桥。既然以桥为题,在活动中自然少不了桥文化的渗透。于是,在开营后不久,营员们便来到了历史名城乌镇,开启了一场“寻桥之旅”。

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乌镇古桥众多,且每座桥都风格独特、历史悠久。一开始,营员们

是想走遍乌镇所有的桥,但出发后不久,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便改变了想法。

“一开始我们也想追求数量,但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停下来,好好欣赏一座桥也很不错。”采访中,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蔡明城说,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座廊桥停了下来,仔细研究桥梁结构,听当地人诉说这座古桥的历史。“当时还有一位随行的老师,为我们讲解着相关的概念,他看待这座桥的视角真的与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很受启发。”蔡明城说。

就在营员们流连于古镇的各色水桥之上时,一些人也慢慢发现,面对古桥,大陆与台湾的学生也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个性与特点。

台湾某大学教师洪汶宜是此次训练营的一位带队老师,在观察两岸学生的一些表现后,他作出了这样一番比较:“面对新鲜事物,台湾学生要更加开放,更加活泼;大陆学生在很多时候有些‘放不开’,但更加认真和专注。这可能是两岸不同教育环境所导致的。”

当时洪汶宜并不知道,在结束乌镇之旅后,营员们还要完成更多的任务,经历更多的活动,两岸学生的这点不同在此后的活动中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而此次训练营带给他的启示也远非如此。

一份期待

结束乌镇行程,营员们真正开始了此次训练营最主要的任务——为当地小朋友设计科学装置,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学生活跃的个性和大陆学生认真的态度有了更淋漓尽致的表现。

“台湾的同学更外向、活跃,在讨论中的发言也更踊跃。”裘道所在小组此次设计的是一个与力学结构有关的拱桥,另外还设计了一个展示摩擦力的小装置,这些装置的创意最初就来

自于台湾同学的提议。创意提出后,组里的几位同学通力合作,最后由裘道这位“非理工男”负责装置的讲解。

“我们这叫分工合作。”裘道笑道。

对于最终展示在小朋友面前的几十台科学装置,身为老师的洪汶宜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整体而言,这些作品是在我的预期之上的。但有些遗憾的是,由于同学们平时很少有讲解科学知识经历,所以他们在为小朋友讲解装置背后的科学原理时,常常抓不到重点。”

对于洪汶宜的观点,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营员们也有着相同的体会。

“我觉得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没有想清楚到底想给小朋友展示什么,我们的侧重点有一点点问题。如果再有下次机会的话,我首先会搞清楚这省略了什么,该突出什么。”说这番话时,裘道的语气中多了一份期待。

经历这次活动后,内心充满期待的远不止裘道一人。比如洪汶宜就觉得营员们在展示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正是自己在未来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我们是搞土木的,如果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连自己的想法都表达不完善,又怎么要求对方信任我们的设计呢?他想着在回到台湾后,好好在这方面的教学中下一番功夫。”这也是此次训练营给我最大的启发。

当然,还有人的期待更直接一些。蔡明城在杭州的这几天,一直盘算着找机会欣赏一下美丽的西湖日出,但因为忙于设计装置,直到离开杭州,他的这一愿望也没有实现。“他和我聊过这件事,他的‘怨念’还挺强的。”和蔡明城同组的单萍笑道。

当然,蔡明城要弥补这一遗憾也不难,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会作为一名交换生,再次来到大陆,那时壮美的日出依然会在西湖岸边等待他的到来。

中国大学评论

只要交一千多元钱,一篇职称论文就能代写保发,而学位论文则要贵一些。博士论文大概一篇五六万元,硕士论文则是五千到一万元,难度大一些的比如医学类的论文则要更贵,一篇硕士论文要价大概一万七千元左右。

论文造假,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近年来,从教授博导到普通学生,媒体曝光的论文造假事件呈高发态势。央视新闻的记者历经两个多月的调查,“潜伏”进了多家论文造假公司,发现论文造假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代写论文已形成庞大的产业,这早已不是秘密。有关研究者早在2009年就发布调查结果指出,我国代写论文市场的“产值”已达10亿元。但从代写论文问题被曝光至今,对于代写论文,我国高校却没有动真格进行治理的意思。因此,一边是代写论文接连被曝光,另一边却是代写论文更加明目张胆。代写论文产业链日益庞大,表明我国高校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仍旧以行政与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实行学术本位管理。

代写论文产业链,首先来自畸形的论文需求。众所周知,之所以有代写论文的需求,关键在于我国高校不论对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求学,还是对老师的考核、评价、职称晋升,都提出撰写、发表论文的要求。对此,学校的理由是: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撰写、发表论文,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求老师发表论文,是希望老师重视学术研究,并把学术研究成果用于教育教学。但这种要求在老师和学生那里,变成了“为论文而论文”,有人根本没有学术创新,但却要拼凑、炮制论文,为此不但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拼凑出的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垃圾论文。

论文本应该是创新成果的表达,因此撰写、发表论文必须尊重创新的规律。按照创新的规律,在学术研究中,取得创新成果谈何容易?因此,国外大学是没有对硕士、博士研究生提出在校期间要撰写、发表论文要求的,甚至对硕士生都没有学位论文要求。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是通过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加强过程性评价实现。我国却恰恰相反,不重视课堂教学质量,却希望通过撰写、发表论文的要求来抓质量,这是本末倒置。

国外大学在考核教师时,重点关注的是教师本人的教育能力、教育贡献以及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但评价教育和学术的能力与贡献却不“唯论文论”,重视教师同行评价,即同行委员会怎样评价教师。而在我国,对教师实行的是行政评价,而论文数、课题数、经费数,就是行政化的量化指标,这不会引导做好教育和科研,而令他们专注于怎样发表论文、搞到课题。

其中有另一个严重问题。即我国高校是把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学校的重要办学政绩的。高校重视论文的发表(以前重视发表数量、近年来也重视发表的期刊档次),超过重视论文本身的价值;很多学校在评价学生和教师时,只要求提交发表论文的题目、期刊以及发表期刊的封面、目录,根本不论文本身进行审阅,其对教师和学生提出论文要求的用意昭然若揭,哪是重视质量,分明是追求论文政绩。这也就不难理解代写论文市场的红火了。

如果在评价论文时,不只看是否有论文以及论文是否发表,而是要阅评论文本身的质量,那即便有论文需求,也不至于出现代写论文——没有投入研究而撰写、发表论文是难以通过严格的学术答辩和评审的。有的硕士、博士就连学位论文也请人代写。本来硕士、博士论文是需要经过严格答辩的,但有的高校这一关也是走过场,以至于出现同门师兄论文完全抄袭,导师却“没有察觉”这样的奇谈怪事。

另外,由于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校的政绩相关,因此,与高校外部形成论文发表产业链对应,高校内部形成了“论文利益共同体”。论文造假、论文抄袭、代写论文等被社会舆论质疑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高校处理起来都不积极,有的被轻描淡写,有的不了了之。就像这次,媒体曝光的这家论文代写公司的客户名单中涉及超过500所高校的学生,如果高校对此负责任的话,应该启动调查,对花钱购买论文的行为进行严查。然而,此事最可能没有后续,像以往每次对代写论文的曝光一样,没有高校当回事。事实上,由于论文造假、抄袭变得越来越普遍,老师、学生花钱买论文,还被视为比较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毕竟是花了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论文,那些凭自己手中行政权力在没有参与研究的论文、成果上署名(且署名第一作者)的,才是性质更恶劣的不劳而获的不端行为,当这类行为大行其道时,对代写论文,谁会认真查处呢?

说到底,代写论文源于学术管理、评价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学术行政管理、评价,提出畸形的论文要求;为达到需求,教师和学生被“逼良为娼”;各类社会机构(包括期刊杂志)针对论文需求推出“商业化”服务;对于不端行为,行政管理部門再出于利益视而不见……因此,治理包括代写论文在内的所有学术不端行为,必须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去功利化,这样才能恢复学术生态,引导师生有崇高的学术理想和正确的学术规范。

代写论文的庞大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冰启